

說「大朝」：元朝建號前 蒙古的漢文國號

——兼論蒙元國號的演變——

蕭 啓 慶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中國歷代的國號，皆有特殊的意義，與各朝的背景具有密切的關聯。漢族王朝與邊疆民族所建各王朝的背景互異，國號的來源與演變也因而不同。漢族王朝的國號，或是取自初興之地的地名，或是採用封邑的名稱，大多一次而定。而邊疆民族王朝國號的演變較多曲折，最初多以種族或部族命名，僅在控制漢人地區並建立邊境國家或征服王朝後，始採用漢式國號，以減低種族色彩，增強政治號召。但是漢式國號主要用以羈縻漢人，贏取中原正統。在本族語文中，多仍因襲舊號，不肆更革，以利本族之團結。如果邊疆民族所建國家，始終立國故地，未入中原，更不採用漢式國號。秦漢時代的匈奴，隋唐時代的突厥（Türk）、回鶻（Uyghur）雖都聲勢壯大，立國久長，但都未更名。總之，國號是一種政治符號，名稱的演變，往往反映國家性質的嬗遞，在政治與文化上都具有相當的意義¹。

1 阿保機於九一六年建國時，以族名契丹（Kitan）為國號。遼朝一號則採行於大同元年（947），當時契丹方陷大梁，有久居中原之意。（另說改號于天顯十三年〔938〕，見佟家江，「契丹首次改遼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4, pp. 58—60）姚師從吾曾指出：「『大遼』當是漢地新朝的通稱，而不遑行於本部」（見所著「契丹漢化的分析」，姚從吾先生全集，五〔台北1981〕，p. 35），以後於聖宗統和元年（983）正式恢復契丹國號，但於道宗清寧元年（1055）又復用大遼一名（馮家昇，「契丹名號考釋」，燕京學報 13（1933），1—48）。可見遼朝始終搖擺於漢式國號與種族舊稱之間。至於滿洲初起之國號，黃彰健先生曾指出：奴兒哈赤所用之國號凡五變，計為女直、女真、建州、後金、金（見所著「奴兒哈赤所建國號考」，明清史研究叢考〔台北1977〕，p. 48）。可見滿清最先亦以族名為國號。

在過去一般印象中，元世祖忽必烈汗（Qubilai Qaghan, 1260-94）於至元八年（1271）採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無國號。實際的情形，並非如此。自成吉思汗（Chinggis Qan, 1206-27）時代開始，即有 Yeke Mongghol Ulus 的國號，漢譯為「大蒙古國」。這一事實，自柯立夫師（F. W. Cleaves）及田清波神甫（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詳加論證後²，卅年來，學者知者漸多³。但是，蒙古政權在漢地曾使用「大朝」為國號一事，一直受到中外歷史學人的忽視⁴。過去僅有古泉及金石學者注意到此一重要名詞。而古泉及金石學者亦未能加以系統論證，更未能指出其應有的歷史意義⁵。

本文的目的在于證明「大朝」確為蒙古在漢地使用的國號，探討其由來及使用的起訖時期，並進一步探索蒙元國號的演變及「大朝」一名在其中的

聰十年（1636）改國號為金，乃因當時太宗皇太極已有征服中原之志，而漢人以前對金朝積怨頗深，為減少漢人疑慮，故改號為清。實際上，「清」與「金」不過一音之轉，在滿文發音中并無區別。見孫文良等，清太宗全傳（長春1983），pp. 266—267。關於邊疆民族所建國家的一般國號與年號，參看陸峻嶺、林幹合編，中國歷代各族紀年表，呼和浩特，1980。

- 2 F. W.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以下簡寫作 *HJAS*) 12 (1949), pp. 94—95 n. 6; A. Mostaert et F. W. Cleaves,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etes vaticanes," *HJAS* 15 (1952), pp. 486—491.
- 3 近人論及大蒙古國一辭者尚有：韓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國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見所著穹廬集（上海 1982），p. 192，註1；Chin-fu Hung（洪金富），"China and the Nomads: Misconception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on Inner Asia," *HJAS* 41 (1981), pp. 608—609; Igor de Rachewiltz, "Qan, Qa'an and the Seal of Güyüg," in K. Sagaster and M. Weiers (eds.), *Documenta Barbarorum* (Wiesbaden, 1984), 270—281。柯、田二氏譯 Yeke Mongghol Ulus 為 "empire des Grands Mongols"，而羅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氏則提出異議，認為應譯作 "Great Mongol Nation."
- 4 屠寄蒙兀兒史記與柯紹忞新元史皆未提及此名詞。王國維校註趙珙蒙鞑備錄，考證甚詳，於大朝一辭，却未加註，顯然視之為普通名詞，而無註釋的必要。見蒙鞑備錄（蒙古史料四種本），3b。趙氏原文將引見下文。
- 5 金石學者對大朝一辭的討論，都很簡單。如胡聘之說：「按元至世祖，始建國名。故憲宗前所立碑版，多署大蒙古、大朝等號」（山右石刻叢編）〔光緒27年刻本〕，24. 3b；又如沈澐說：「案元自世祖以前，未建國號，亦無年號紀年。國中軍民文書，但稱『大朝』，以甲子紀年而已」（常山貞石志〔光緒22年刊本〕15. 18a）。古泉學者中以翁樹培及宣哲網羅材料最富。分別見於翁氏古泉彙考（無刊本）及宣氏「大朝通寶續考」，皆引見丁福保編，古錢大辭典（上海 1938），下編，95a—95b, 95b—97b。

地位，更希望從國號的更革中看出蒙元國家性質的轉變。

二

「大朝」一辭，在當時史料中，出現極為頻繁。現依史料的性質，分為四類，以求證明確為蒙古政權在漢地的國號。

甲、錢 幣

大蒙古國在漢地所鑄錢幣，今仍存世的僅有兩種，皆以「大朝」命名。此二種錢幣為「大朝金合」與「大朝通寶」。「金合」質白銅，文字有正書與篆書二種，而「通寶」則有金質與銀質之別。古泉學者清朝翁樹培（1765—1811）、李佐賢（道光十五年進士）、民國羅伯昭、宣哲（古愚）、陳進宜及日本奧平昌洪等⁶，皆認為係蒙古未改大元以前所鑄。羅伯昭並認為大朝錢兩種皆為輔幣，乃係鑄以權鈔者。而奧平昌洪則認為大朝通寶是為佈施寺院而鑄造，俗稱「供養錢」或「廟宇錢」，與一般通貨有別。但無論是輔助貨幣抑為供養錢，都係以大朝為號，可見大朝是一種正式名號，而且甚為通行。

乙、公 文

公文用語，代表官方立場。「大朝」是否為一正式國號，於公文中加以探索，最為直接。宋人趙珙蒙鞬備錄「國號年號」一節說：

「去年春，珙每見所行文字，猶曰『大朝』。」⁷

趙珙於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出使蒙古，行抵燕京。翌年歸後，撰成備錄。由其所記可見當時蒙古於漢地所行公文中多用「大朝」。不過，當時公文現仍存世者不多，用到大朝一辭的更少。窩濶台汗（Ögödei Qaghan, 1229-1241）十二年（1240）「諭高麗詔」說：

「若將民戶數目隱匿，依大朝條例治罪。」⁸

此處「大朝條例」顯係指蒙古法令——「札撒」（jasagh）而言。

6 參看李佐賢，古泉匯（同治3年石泉書屋本），貞集，2.7b；陳進宜，「元大朝金合錢考」，古泉學，1:5（1937年6月），p. 34；奧平昌洪，東亞泉志（東京 1939），11.54b—55a，羅伯昭，「元初權鈔錢說」，古錢大辭典，「總論」，58a—61b

7 蒙鞬備錄，3b。

8 元高麗紀事（學術叢編本），7a。

高麗史「高宗世家」中亦有一例，即高宗十八年（1231）所受蒙古來牒，質問使臣被殺事。其中「大朝」二字用法較為特殊。牒文說：

「蒙古大朝國皇帝聖旨，專命撒里打·火里赤（Sartagh Qorchi）統領大軍，前去高麗國，問當時如何殺了著古與（*Jaghuyu）使臣？」⁹

此一牒文原由蒙文直譯為漢文。其中「蒙古大朝國」一辭，當係由 Yeke Mongghol Ulus 一辭譯來，此辭的漢文直譯為「大蒙古國」，而在漢地的慣譯則為「大朝」。此牒譯文顯係合二為一，而成「蒙古大朝國」¹⁰。漢文碑乘中也有「大朝蒙古國」¹¹的用法，可見「大朝」與「大蒙古國」常相混用。

丙、碑 傳

現存石刻集、石刻目錄以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乘文字，提及大朝者很多¹²。這些史料中，大朝一辭有下列三種用法：

第一、用於碑首的標題，冠於地名、人名之上作國號用。如李庭撰「大朝宣差京兆路總管僕散夫人溫迪罕氏墓誌銘」¹³、王鶚撰「大朝宣差萬戶張侯孝思之碑」¹⁴及郝希哲、湯舉合撰「大朝故九原帥府都總押觀察使樊公墓表」¹⁵等都是。用於碑首者又有「大朝國」的用法，更可見出「大朝」是用為國號，如「三靈侯廟像記」，碑首作「大朝國解州聞喜縣」¹⁶，「修釋迦

9 鄭麟趾，高麗史（國書刊行會本），23.344b。此牒有日本村上正二の日譯及美國 Gari Ledyard 的英譯。見村上，「蒙古來牒の翻譯」，朝鮮學報 17 (1960), 81—86; Ledyard, "Two Mongol Documents from the Koryō Sa,"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3 (1963), 225—239。

10 村上正二與 Ledyard 皆認為「蒙古大朝國聖旨」為蒙文聖旨慣有詞頭「Yeke Mongol-un ulus-u qa'an-u jarligh」之漢譯（啓慶按：正確之拼法應為 Yeke Mongghol Ulus-un qa'an-u jarligh），應該不錯。不過，Ledyard 又認為漢譯中之「朝」字係贅字，不知「大朝」為一久已通行的名詞，并非譯者杜撰或粗失之誤。

11 見任守中，「重修十方雲光洞記」，著錄於吳式芬編，攬古錄（吳氏家刻本）17.9a；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石刻史料叢書乙編本）9.50b。

12 筆者搜求所得，合翁樹培及宣哲二氏所引，共有八十五條；其中得自文集者共有十五條，得自金石集者則有七十條。此處不及細列，下文僅加舉例。

13 李庭，寓菴集（藕香零拾本）6.68b—69a。

14 此碑乃係關於漢軍名將張柔者，甚為重要，迄未收入金石集中。筆者所用為拓本，今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15 牛誠修編，定襄金石考（雪華館叢編本）2.21a—21b。

16 山右石刻叢編 25.1a。

院記」則作「大朝國懷州河內縣」¹⁷。

第二、用於碑末所記立石或撰文年月之上，兼具國號與年號的作用。元代採用年號前的碑刻，有的不冠國號，選以甲子繫年，如「歲次辛卯」、「歲次甲辰」之類。有的以動物名稱繫年，如「狗兒年」、「鷄兒年」之類，在漢譯蒙文白話碑文中尤見普遍。另一種則冠以「大朝」或「大蒙古國」的國號。相較之下，冠以「大朝」者遠多于以「大蒙古國」為稱者¹⁸。例如「尊勝陀羅尼真言幢」，署為「大朝壬子七月立石」¹⁹；「盤屋重陽萬壽宮聖旨碑」，為「大朝辛亥七月初九日立石」²⁰；「大蒙古國累朝崇道教序」，為「大朝辛亥七月立石」²¹等都是。

第三、大朝二字，置於碑傳正文之中，或用於繫年，或用於紀事。用於繫年者如張本「德興府秋陽觀記」說：

「大朝庚辰歲（1220），長春真人臥雲海上，以真風玄行聞於輦轂。」²²

又如李俊民「重修悟真觀記」說：

「大朝丁酉歲（1237），遣使馬珍考試天下隨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²³

又如元好問「中令耶律公祭先妣文」也說：

「維大朝癸卯歲（1243）八月乙巳朔。」²⁴

用於紀事時，皆指蒙古而言，如顧行「重修王母宮碑」內有：

「大朝有天下，元帥史公闡濶都，被命為涇那二州達魯花赤。」²⁵

又如李俊民「故王公輔之墓誌銘」內也有：

「大朝委劉中試諸路精業儒人，（王）從儉中平蕩選。」²⁶

17 顧燮光，河朔金石目（上海 1930）7.7b。

18 見註57及58。

19 常山貞石志15.17b。

20 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 1955），p. 117。

21 攔古錄，17.6b，金石集目分經12A. 100a。

22 李道謙編，甘水仙源錄（王統道藏本）9.239a。

23 李俊民，莊靖集（四庫珍本十集）8.15b。

24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四部叢刊）40.8a。

25 張維編，隴右金石錄（石刻史料叢書甲編）5.8b。

26 莊靖集9.15b。

碑傳文字中用大朝一名者，存於石刻者遠較存於文集者為普遍，因石刻所存多保持原狀，而文集多經後人刪改。「大朝」二字恐多改為「皇元」、「大元」等辭。

丁、史 籍

史籍多出于後人手筆。在名辭運用上，往往反映史家所處時代的觀念，未必保持史事發生時的習慣用語。因而，要在史籍中發現「大朝」這類名詞，遠較石刻集中困難。但在元季、明初所修的宋、金、元史中，仍有數處提及大朝。如宋史「理宗本紀」贊說：

「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²⁷

又如至正五年（1345）阿魯圖（Arughtu）等進金史表說：

「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²⁸

又如元史「任志傳」說：

「志與金兵戰。金擒其子如山，招之降。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²⁹

像這類「大朝」的用法，當係沿襲碑傳舊稱，可說是史家編輯後的漏網之魚。

正史之外，相傳為宇文懋昭所著的大金國志也有幾處提及大朝。「章宗紀年」卷上記述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愛王叛金，引蒙古為助說：

「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王曰：『主以討臣，今茲之來，頭勢甚重。……不若求援於大朝，為討之』。愛王許諾。」

³⁰

此處之大朝，即指蒙古而言。又「東海郡侯紀年」卷上記述蒙古之興說：

「又有蒙古國，在女真東北，唐謂之蒙兀部。……蒙人稱帝，既侵金國，……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³¹

同卷中又有「大朝國勢益強」，「今盡為大朝所有」等語³²。大朝皆係指蒙古，而非指金朝。

27 宋史（百衲本）45.20a。

28 金史（百衲本），目錄上，3a。

29 元史（百衲本）193.6a。

30 大金國志（國學基本叢書本）19. 139—140。

31 同上，22.157。

32 同上22. 156—157。

元代中葉人釋念常所著佛祖歷代通載，為佛教重要史籍，於蒙元史事記載甚詳，多可補明修元史之缺陋。其中記述多以「大朝」稱蒙古。例如：壬辰（1234）年，「大朝遣使過宋，議夾攻金。」「庚戌（1250），大朝滅遼東、高麗。」庚申年（1260），「大朝遣郝經通好」等都是³³。可見元代史家對大朝一名，仍多熟諳。

在上述四類史料中，碑傳顯示出大朝一辭在當時士民之間，施用極廣，兼具國號與年號的作用。錢幣及公文則反映此一名詞不僅是民間習慣用語，而且是官方使用的名稱。史籍的記載雖僅可視為二手史料，但也足以顯示，此名詞曾經通行於一時，且為史家所通曉。

「大朝」一名的使用，始於何時？終於何時？在現存史料中，當以前引大金國志所記史事為最早。若「章宗紀年」明昌五年一條所記為真實，則一一九四年時大朝一名即已存在。但是其時下距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尚有十二年，蒙古與中原接觸不多，當不致已有此漢式名號。而且大金國志一書的本身亦有問題。國志雖號稱為金歸正人宇文懋昭於端平元年（1234）進呈於宋廷，自來學者多認其為偽書³⁴。所記明昌五年愛王叛金事，王靜安（國維）先生已指出係鈔自張師顏金人南遷錄，而南遷錄的本身便是偽書³⁵。至於本文前引「東海郡侯紀年」一條，則係鈔自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其中「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一句，雜記原作「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³⁶。可知「大朝」二字乃是篡改「韃靼」而來。改韃靼為大朝，反映後來人的觀念，而無法據以斷定「大朝」一名起源甚早。而雜記乙集成書於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其書用「韃靼」稱蒙古而不用「大朝」，或反映大朝一辭尚未採行，至少南宋人知者不多。

現存的可靠史料提及大朝者，以前引蒙韃備錄為最早。根據備錄，得知大朝一號的使用，不得遲於一二二一年趙珙出使時³⁷。現存石刻及文集中碑傳以大朝繫年者，時間皆不甚早。最早者為「牛頭寺長春真人述」，所繫為

33 佛祖歷代通載（大正新修藏經本）21. 702a. 702b. 705a。

34 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上海 1936）50. 5b—6a；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 1958），5.269—271。

35 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 1970），第2冊，725—751。

36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宋史資料第一輯），乙集，19. 10a。

37 同註7。

癸未年（1223）³⁸。其次則為「重陽萬壽宮記」，立石於己丑年（1229）³⁹。早期碑刻不以大朝繫年，一方面固然可能由於其時蒙古在中原佔地未廣，而且戰塵未定，蒙金孰存孰亡，未可逆料，士民不願輕奉蒙古正朔，以免遭受橫逆。更可能是「大朝」一名，尚未採行，以致仍以甲子紀年。

忽必烈定都中原後，先後採行中統（1260—63）、至元（1264—94）為年號。漢式年號採行後，大朝一名，施用仍廣。一方面，繫年時仍常以「大朝」冠於年號之上，如「釋迦院常住記」，末作「大朝至元二年二月造」⁴⁰；「性公通玄大師塔幢」，署作「大朝至元四年」⁴¹。另一方面，也有碑末僅以年號紀年，碑首却仍冠大朝國號者，如至元六年之「大朝故九原帥府總押觀察使樊公墓表」⁴²，至元七年之「大朝濟瀆投龍記」⁴³等都可為例。可見此時「大朝」與「中統」、「至元」相並行，一為國號，一為年號，作用不同。不過自至元八年（1271）採行「大元」為國號後，「大朝」遂失去國號的作用。此後的史料中，大朝之名，僅有二例。一為至元廿年（1283）之「憲州權官之銘」，碑首仍冠大朝之號⁴⁴。另一例則見於高麗史「刑法志」。該志忠烈王五年（1278）記載說：「都兵馬使據判出牒云：『大朝令諸路斷酒，國家亦宜行之。』」⁴⁵應該皆為因循舊習而加使用。大勢所趨，則是稱「元朝」而不再稱「大朝」。

三

「大朝」一辭，來源如何？在蒙元國號演變中有何意義？關於其來源，過去秦寶瓚認為「蒙古未入中國前，版圖最廣，故稱大朝」⁴⁶。而宣哲認為

38 畢沅，關中金石記（叢書集成本）8.156；金石錄分編12A.19a。

39 據古錄17.5b。

40 顧燮光，河朔訪古新錄（上海 1930），3.4b。

41 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光緒32年刻本）15.11a。

42 同註15。

43 河朔訪古新錄11.6a。

44 山右石刻叢編26.42a。

45 高麗史85.706a。

46 秦寶瓚，遺篋錄，自刊本，刊地不詳，光緒29年刻本，原書未見，引自古錢大辭典，下編，97b。

「大朝」不過與「國朝」、「皇朝」相當，是一種尊稱⁴⁷。這兩種說法，都不過臆測而已。

實際上，「大朝」與「大蒙古國」都是蒙文 *Yeke Mongghol Ulus* 的漢譯。後者為直譯，前者為簡譯。在此簡譯中，省去種族之稱的蒙古，並將原義為「人民」、「國家」的 *ulus* 一字⁴⁸，依漢人的觀念，譯為「朝」字。如前文所說，漢文史料中亦有「蒙古大朝國」、「大朝蒙古國」的用法。一方面反映當時名詞使用的混淆，另一方面也顯示「大朝」與「大蒙古國」二辭皆由 *Yeke Mongghol Ulus* 而來，而「大朝」可說是一種更為漢化的譯法。

大朝一辭，既係由 *Yeke Mongghol Ulus* 而來，要尋求「大朝」的歷史意義，必須自後者下手。成吉思汗究在何時採用 *Yeke Mongghol Ulus* 一名為國號，因缺乏明確的記述，已難以確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稱成吉思汗先世已自號大蒙古國⁴⁹，其事不可信⁵⁰。一二〇六年全蒙古統一時，有關史料皆記載於此時採用成吉思汗尊號事，但未言及採行國號⁵¹。但從蒙古人歷史發展看來，*Yeke Mongghol Ulus* 一號採用於此時最有可能，蓋此時成吉思汗不僅為蒙古部之主宰，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為其家產，故以 *Yeke*

47 同上，下編，96a。

48 “Ulus” 一詞，有人民，部族聯合體、分地以及國家等義。見符拉基米爾佐夫 (B. Ya. Vladimirtsov) 著、劉榮竣譯蒙古社會制度史 (北京 1980)，p. 155

49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19. 10a。

50 王國維已指出：李氏所記多本於王大觀行程錄，而行程錄則為偽書，所記與史實多所牴牾，同註35。

51 中外史料中言及此時採用「大蒙古國」為國號者，唯有幻輪著釋氏稽古略續集：「元自太祖成吉思皇帝，於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歲（1206），法天啓運，稱聖武年號，建大蒙古國號」（大正新修大藏經本，1.903c）。但是幻輪為明季僧人，不諳蒙古史事，所言不足為據。

52 蒙古早期文獻中，又有“Qamugh Mongghol Ulus”一辭，容易引起混淆，誤為國號（參看 N. Ts. Munkuyev, “Novye Materialy Polvenii Mongol’skikh,” in *Tataro-Mongolv Azii i Evrope* [Moskva, 1970], 382—418)。不過，元朝祕史中僅有“qamugh Mongghol”（旁譯為「普達達」）與“qamugh ulus”（旁譯為「普百姓」）（分見於第52及254節）。柯立夫師譯前者為“all the Mongghols”，後者為“the whole nation”，皆譯為普通片語而非專名，見 F. W. Cleave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ss., 1982), p. 11 and 191. “Qamugh Mongghol Ulus”全詞，最早僅見於一二二五年左右所立之所謂「成吉思汗石」，為時甚晚。羅意果教授譯作“the empire of all the Mongols”，見 de Rachewiltz, “Some Remarks on the Stele of Yisünger,” in W. Heissig, et. al. (eds.),

Mongghol Ulus 稱其國家，最爲適宜⁵²。Yeke Mongghol Ulus 一名之採用至遲亦不得晚於一二一一年伐金之時⁵³。這一名稱此後遂成爲日益擴大的蒙古帝國的正式國號，在公文——尤其是外交文書上當多用之。在現存史料中，最早載有蒙文 Yeke Mongghol Ulus 全名者卽爲一二四六年貴由汗（Güyüg Qaghan, 1246-48）致羅馬教皇英諾森（Innocent IV）國書所用璽書。璽書前半部爲：「長生天氣力裏，大蒙古國與寰宇之汗聖旨」（Möngke tngri-yin küchüdür Yeke Mongghol Ulus-un dalai-in Qanu jrlgh）（見附圖二）⁵⁴，可以爲證。

「大朝」與「大蒙古國」則是使用於漢地的漢文國號。漢文「大蒙古國」一名在伐金之初當已採用。元史「耶律留哥傳」記載一二一二年事，稱留哥與按陳·那衍（Alchin Noyan）訂盟時說：「願附大蒙古國，削平疆宇。」⁵⁵ 元史所說固然出于事後的記載，不盡可信。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用及此一名詞，而雜記成書于嘉定九年（1216），足證「大蒙古國」的漢名在一二一六年前必已通行。

至於「大朝」一名，如前文所說，其採行的下限不得晚於一二二一年。從當時的歷史環境判斷，此號的採用，大概是在一二一七年木華黎（Muqali, 1170-1223）受命伐金，建牙燕京以後。此時蒙古雖然仍爲以草原爲重心的

Tractata Altaica (Weisbaden, 1976), p. 487; 最近羅氏又提出修正，認爲應譯爲“the entire Mongol Nation”，見前引“Qan, Qa’an, and the Seal of Güyüg,” p. 279 n. 21。哈勘楚倫教授則譯作「泛蒙古國」，見所著「成吉思汗五行碑文與道爾吉板薩老夫」，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年報，14 (1983), p. 131。顯然，“Qamugh Mongghol Ulus”一辭，僅爲一種族觀念，指全部蒙古人民而言，而非國號。

53 元季歐陽玄「高昌僕氏家傳敘一二〇九年畏兀兒歸降事，言及此俚伽帖穆爾（Bilgä Tämür）建言國主：「孛吾衆歸大蒙古國」（圭齋文集〔四部叢刊〕11.5b）。畏兀兒語與蒙語相通，此俚伽所指當爲蒙文國號。可見此時已有 Yeke Mongghol Ulus 一號。而佛祖歷代通載則繫「大蒙古國號始建」於辛未（1211）」（207.701a）。

54 此一國書波斯文原件，今藏於梵蒂岡祕檔（Secret Archives of Vatican）。本處璽書照片，係採自 de Rachewiltz, “Qan, Qa’an and the Seal of Güyüg,” plate I。此璽之對音及全文翻譯，見 A. Mostaert et F. W. Cleaves, *op. cit.*, pp. 485 and 494—495。本處譯“Yeke Mongghol Ulus-un dalai-in qanu jrlgh”爲「大蒙古國與全世界之汗聖旨」，係從羅意果說，以 Yeke Mongghol Ulus-un 與 dalai-in 爲雙重所有格（見羅氏前揭文，p. 275）。與田、柯二氏譯法不同。

55 元史149.2b。

游牧國家，但已有加速征服漢地、增強殖民統治的意圖。在金朝降臣慫恿下，開始採用中原的部份文物制度。趙珙說：

「彼亦不知其爲蒙是何等名字，何謂國號？何謂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強解事以教之耳？」⁵⁶

又說：

「又稱年號曰兔兒年、龍兒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1220），今日辛巳年（1221）是也」⁵⁷。

「大朝」一名的採用，當爲此一系列採行漢制中的一環。「大蒙古國」一名顯然種族意味過強，不足以羈縻漢地土民，遂將其簡化爲「大朝」。「大朝」之稱，已蘊含中原王朝的意義，不似「大蒙古國」全爲外來征服政權的意味。

「大朝」與「大蒙古國」兩個漢稱，此後並行達五十年之久。但是兩者適用的範圍不盡相同，似有分工的作用。如前文所說，大朝一辭，應用於貨幣、公文，尤其是民間碑乘之上，最爲普遍，但在外交文書上較爲少見。反觀「大蒙古國」一辭，在現存史料中，見於民間碑乘者，不過六起⁵⁷，見於對內公文者不過二起⁵⁸，而在現存外交文書中則佔多數。如中統元年（1260）「和宋書」開端爲「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⁵⁹。中統二年（1261）五月移宋三省牒文詞頭爲「大蒙古國中書省移宋三省」⁶⁰，至元三年（1266）八月招降日本書開端亦爲「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見附圖三）⁶¹。至元八年（1271）九月致日本國書亦以「大蒙古國皇

56 蒙鞑備錄3b。

57 漢文「大蒙古國」一辭，見於碑乘者，有「李君墓誌」（1232），「后土廟重修記」（1242）、「重修玉蓮洞記」（1258），見於山右石刻叢編 24.1b, 24.12b, 24.47a；「一二五一年整厝重陽萬壽宮聖旨碑」，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北京，1955），p. 117 及攬古錄，17.6b；「北京大慶壽寺海雲大禪師碑」（？1255），周康發編陳垣先生廿年史學論集（香港，1971），p. 22；「紫陽真人（楊奐）祭無欲真人」（1255），甘水仙源錄6.0189上。

58 經世大典站赤（永樂大典 19416, p. 7a）所載太宗元年（1229）十一月制云：「大蒙古國，衆寡小大，罔不朝會」；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叢書集成本），卷十二末（p. 156）牌子稱「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云云（1242）。

59 王恽，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本），96.6a，「玉堂嘉話」，4。

60 同上，81.1a，「中堂事記」，中。

61 原書之鈔本，藏於日本奈良東大寺尊勝院，原爲調伏異朝怨敵抄所收。本文採自朝鮮史編修會編，朝鮮史，第三編第四卷（京城，1934），附圖第九。全文亦引見元史 208. 21a；高

帝差國信使趙良弼」啓端⁶²。郝經（1223—75）的幾道致宋朝文移也都以「大蒙古國國信使」的頭銜啓端⁶³，可見外交文書中多用「大蒙古國」，而少用「大朝」。顯然「大蒙古國」爲蒙古的正式漢文國名，使用以對外爲主，「大朝」則稍欠正式，以對內使用爲主。當然，這種分工，不盡嚴格。

「大朝」與「大蒙古國」二漢名，後爲「大元」一號所取代。忽必烈於中統元年（1260）卽位並立國中原後，中原不再是蒙古帝國的殖民地，而已成爲國家的重心，於是遂有仿效漢唐，採用漢式年號、國號的必要，以取得中原正統王朝的地位⁶⁴。而「大朝」一號，究屬權宜，不似正式國號。漢人羣臣紛紛上言，以建國號爲請⁶⁵。忽必烈乃接受劉秉忠（1216—74）的建議，採用「元」字爲國號⁶⁶。

「元朝」一號的採行，雖是蒙元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但其與「大朝」一名的延續性却一直爲學者所忽視。過去學者多認爲「元」字應作肇始解，英譯作“First Beginning”或“Origin”⁶⁷。最近也有人認爲以元爲號，與蒙古舊俗天（tengri）的崇拜有關⁶⁸。「元」字出典于易經。「建國號詔」說：「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⁶⁹，却未敷陳其意義。實際上，易經中「元」字的本義爲「大」⁷⁰，元朝應卽「大朝」之義。劉秉忠等人建議以元朝爲國號時，顯然卽着眼於此義。經世大典「序錄」有明白的解釋：

「蓋聞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爲『大元』也，……。元也者，大

麗史 26. 394b。高麗史略去「上天眷命」四字。

62 朝鮮史，第三編第四卷，p. 443 引東大寺文書。

63 郝經，陵川集（四庫珍本四集），37.1a, 9a, 19b; 39.1a。

64 Herbert Franke,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üan Dynasty* (München, 1978), pp. 26—29。

65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86.9a，「建國號事狀」。

66 元史 157.8a; Hok-lam Chan (陳學森)，“Liu Ping-chung (1216—74), A Buddhist-Taoist Statesman at the Court of Khubilai Khan,” *T'oung Pao* 53(1967), p. 133。

67 E. O. Reischauer and J. K. Fairbank,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 1958), p. 272; H. Franke, *op. cit.*, p. 28。

68 此爲 M. D. Sacchetti 之說，引見 Franke, *op. cit.*, p. 28。另陳述先生主張元字代表黑色，而蒙古人尚黑，故用元爲國號。（「哈喇契丹說—兼論拓拔改姓和元代清代的國號」，歷史研究 1956. 2, pp. 67-77）。按實際上蒙古人尚白而不尚黑，陳先生所言，僅可備一說。

69 國朝文類 9. 5a; 元史 7.13b—14b;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台北，1972）1.2b。

70 高亨，周易大傳今註（北京，1980），53。

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⁷¹

可見「元」之國號，實與「至元」年號相互呼應。而至元的意義又與後來武宗海山汗（Qaishan Qaghan, 1308-11）所採年號「至大」相同。至少就文字的層面看來，「元朝」與「大朝」實為同義，兩者都是 Yeke Mongghol Ulus 的簡譯。不過，「元朝」較「大朝」更富文義，作為中原王朝的國號，較為適合。

「元朝」一號採行後，「大朝」與漢文「大蒙古國」二名，並遭廢棄。但是，三者共同來源的 Yeke Mongghol Ulus 一名在蒙文文書中却延用不衰。現存的幾篇元季漢蒙二文合璧碑中，大元一名，或逕譯為“Yeke Mongghol Ulus”，或譯為“Dai On Yeke Mongghol Ulus”（大元大蒙古國），或譯為“Dai On kemeke Yeke Mongghol Ulus”（稱作大元的大蒙古國）⁷²。形式雖異，意義則一：大元即 Yeke Mongghol Ulus。「大元」不過是繼「大蒙古國」與「大朝」而起的漢文國號，蒙古王朝真正的國號仍是 Yeke Mongghol Ulus。

四

綜言之，蒙古之有「國號」，並不始於忽必烈時代。在採行「大元」一號之前，蒙古已有 Yeke Mongghol Ulus 的蒙文國號及「大蒙古國」與「大朝」二種漢文國號。

在蒙古人看來，蒙古一貫的國號是 Yeke Mongghol Ulus，而「大蒙古國」、「大朝」與「大元」皆不過是蒙文國號隨着環境而改變的三種漢文形態。在此三種漢文國號中，「大朝」是一種過渡形態。「大蒙古國」是蒙文國號的直譯，也是早朝的正式漢文國號。其使用對象不在於漢地士民，而在外交書中施用最為普遍。大朝一名則是中原殖民地化過程中的產物，以羈縻中原漢人為其主要作用，而在漢地士民中使用最為廣泛。而「元朝」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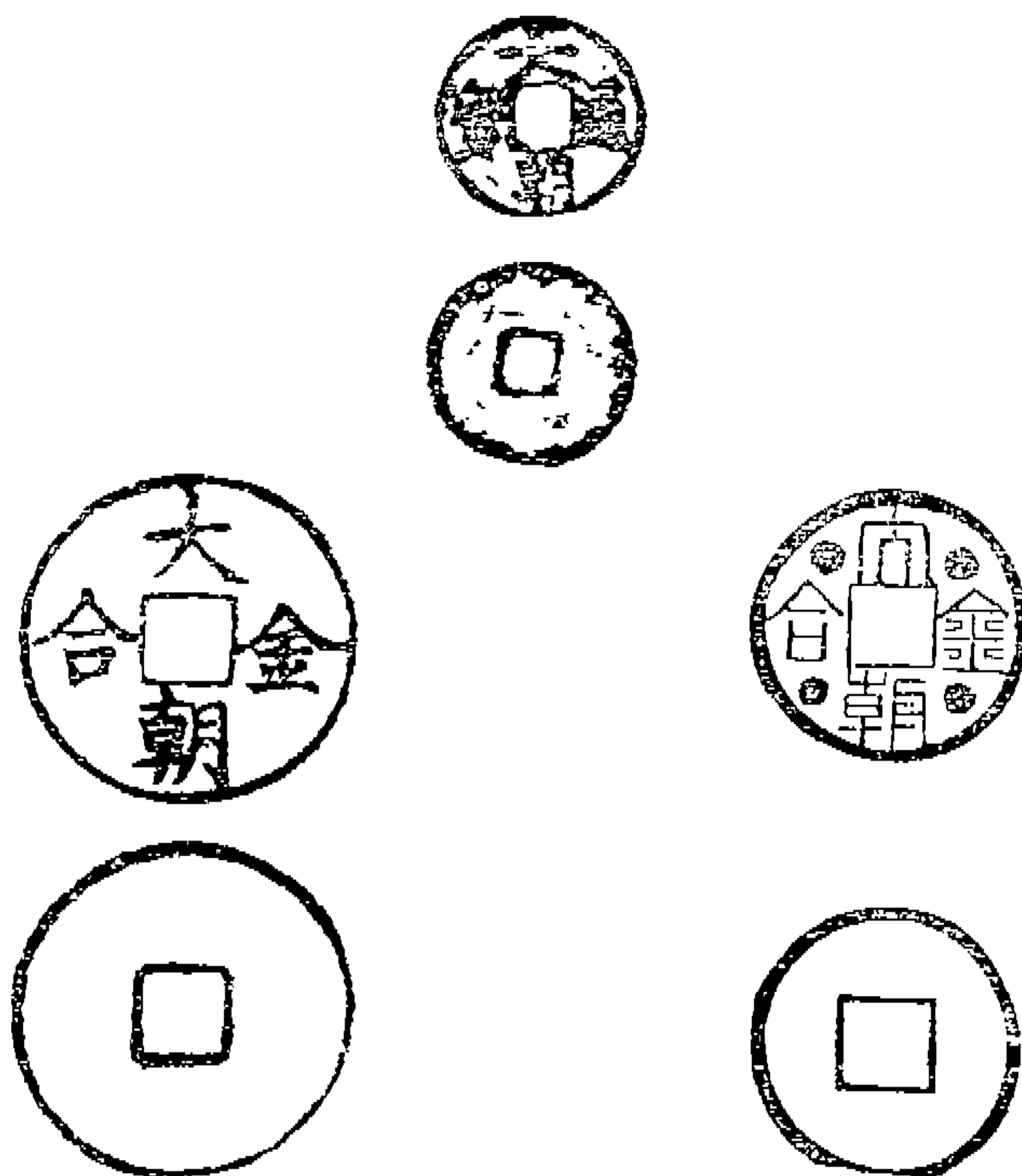
71 國朝文類40.4b。

72 皆見於柯立夫師譯註名碑文中，分別為：“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6,” *HJAS* 15(1952), pp. 70—71;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HJAS* 13(1950), p. 71;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HJAS* 14(1951), 53 and 67; and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pp. 62 and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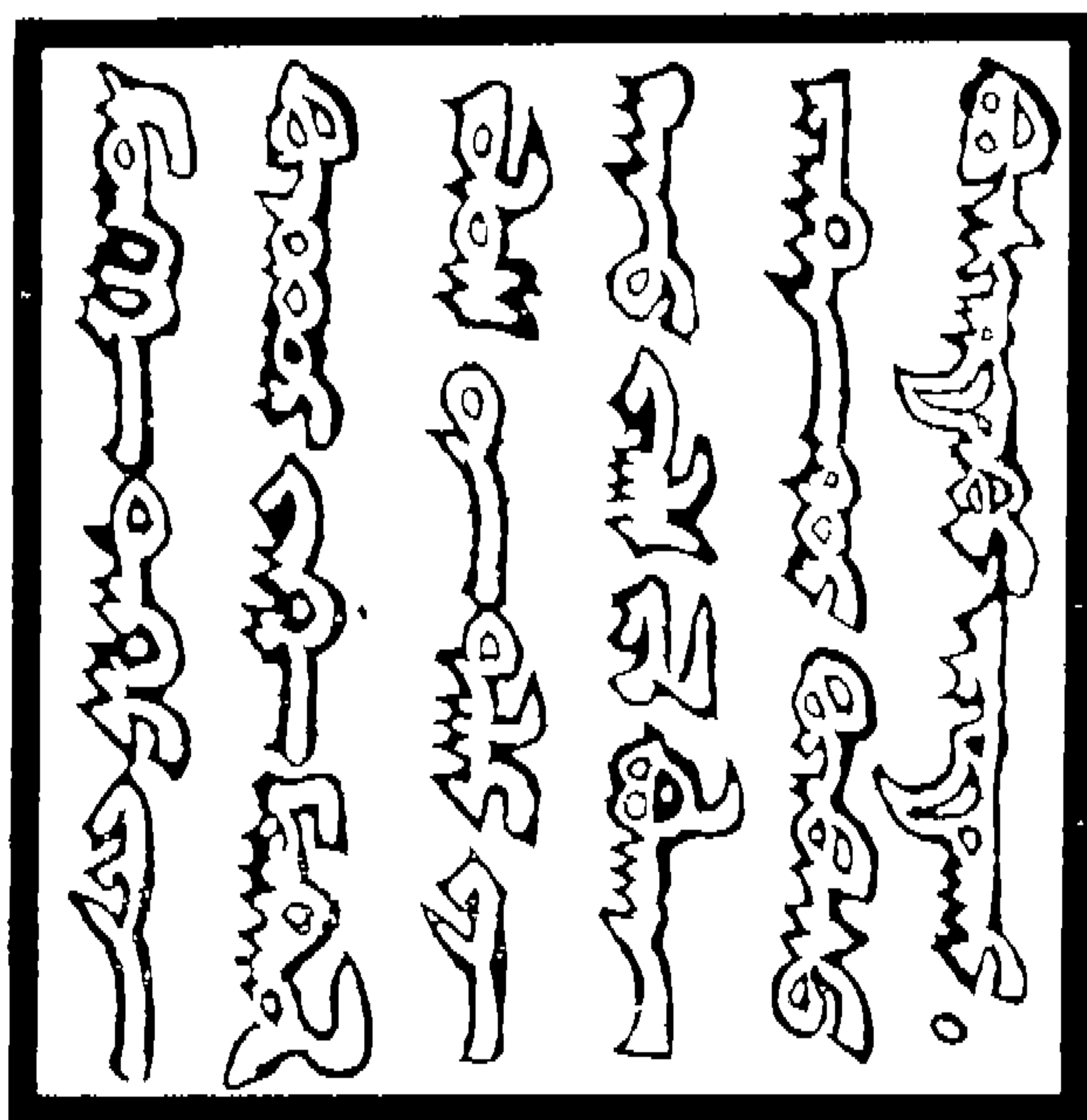
，則採行于立國中原以後。「大朝」與「元朝」兩辭的意義，完全相同，後者不過是前者的文義化。從「大朝」到「元朝」，名號的嬗遞，反映着蒙古從游牧國家到中原王朝轉變的完成。但是，由于蒙元不僅是一中原王朝，而且是一世界帝國，因而「大朝」之名雖隨大元一名的採行而消逝，蒙文原名 Yeke Mongghol Ulus 却繼續沿用不廢，迄於元亡，都未改變⁷³。

[附記] 本文撰成後，承畏友羅意果教授 (Igor de Rachewiltz) 惠讀一過，指正良多，謹誌銘感。

73 明代蒙古人仍自稱為 Yeke Mongghol (見 Mostaert et Cleaves, *op. cit.*, pp. 493—495; Henry Serruys, *The Mongols in China during the Hung-wu Period (1368—1398)* [Bruxelles, 1959], pp. 56—57, n. 64)。而且亦以「大元」為號。如瓦剌 (Oyirad) 部的也先 (Esen Tayishi) 於一四五三年自稱為「大元田盛 (大聖) 大可汗」；而韃靼部的巴圖孟克 (Batu Möngke) 則自稱為「達延汗」 (Dayan Qaghan)，達延汗即「大元汗」之意 (見 Henry Serruys, *op. cit.*, pp. 291—292)。蒙古人此時所處環境與元代已大不相同，但顯然仍以大蒙古國及大元的繼承者自居，欲與明廷爭取正統地位。



附圖一：大朝錢（採自丁福保古錢大辭典）



附圖二：貴由汗鑿書（見註54）

附圖三：招降日本國書（見註61）

上天眷命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

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
境土相接尚務謀信倏睦况我
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
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
位之初以高原元阜之法久瘁
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及其

苑囿高原君臣感戴來朝款難
君臣以歡君父子計

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原朕之
東藩也日本密通高原開闢以
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
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
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
布告朕志與自命以往通問結

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
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至
用兵支就所好
王其國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日

**On "Ta-ch'ao" --
the Early Chinese Name of the Mongol State --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gol State Names**

HSIAO CH'I-CH'ING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first to prove "Ta-ch'ao" or the "Great Dynasty" as an early Chinese official name of the Mongol state, hitherto overlooked by historians, and second to study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Mongol state as reflected in its changing national appellations.

Based on a great variety of evidence -- numismatic materials, chancery documents, epigraphical and literary writings and historical works -- the author shows that "Ta-ch'ao" was widely used in North China as the Mongol state name by the Mongol regime itself as well as in non-official writings. The name was in all likelihood adopted in 1217 or soon thereafter when the general Muqali was entrusted by Chinggis Qan with the task of liquidating the Chin and consolidating Mongol rule in North China. It was a simplified translation of the Mongolian name, "Yeke Mongghol Ulus" or the Great Mongol Nation, which was adopted by Chinggis for his state perhaps in 1206 when he had just united under him all the Mongols. In this translation the word "ulus" which meant in Mongolian "nation" and "state," was rendered as "ch'ao" or dynasty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political practice, whereas the ethnic name "Mongol" was simply omitted. This simplified name was used in parallel with the complet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Yeke Mongghol Ulus," "Ta Meng-ku kuo,"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There was, however, a division of function between these two names: while "Ta Meng-ku kuo" was used mainly in diplomatic documents, "Ta-ch'ao" was used in non-diplomatic official documents as well as in private writings. The former name apparently was the formal Chinese name for the Mongol state, whereas the latter

was adopted for domestic use in North China in order not to offend Chinese racial sensibility when the region was ruled as a colony of the steppe-centered Mongol empire.

“Ta-ch’ao” was replaced by “Ta Yüan” in 1271 as the Mongol state name when Qubilai Qaghan had begun to transform the Mongol steppe empire into a China-centered dynasty.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word “yüan,” however, has been misunderstood by scholars in the past and the continuity between the names “Ta-ch’ao” and “Ta Yüan” has been overlooked. The word “yüan” has been usually interpreted as “origin” and “first beginning.” Actually, the primary meaning of the word in the *Book of Changes (I-ching)*, where the name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taken from, was “great.” That the word was intended to mean “great” rather than “origin” is further confirmed in the *General Preface (hsü-lu)* to the Yüan compendium, *Ching-shih ta-tien*. “Yüan-ch’ao” and “Ta-ch’ao”, therefore, were synonymous with each other insofar as their semantic values were concerned. The former was adopted as the latter’s replacement only because it contained a classical allusion and hence was seen as more suitable as the official name of a China-centered dynasty.

“Ta Meng-ku kuo,” “Ta-ch’ao” and “Yüan-ch’ao,” in conclusion, were all Chinese renditions of the Mongolian name, “Yeke Mongghol Ulus,” used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ogether they epitomized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Mongol state from a steppe empire into a China-based dynasty, “Ta-ch’ao” representing the transitional stage in this development.